

【论 文】

普遍的利益诉求还是少数人的诉求

——新疆维汉民族关系的调查与研究

杨圣敏

民族的本质是什么，人类为什么会划分成不同的民族。自 20 世纪 30 年代以来，这一直是国际学术界研究的问题。近十几年来，随着冷战的结束和世界范围内民族冲突的加剧，对民族本质的研究已经吸引了更多学者，并已成为国际学术界探讨的热点。半个多世纪以来，为了对民族的本质做出解释，学者们创建了很多理论。归纳起来，大略可以将其分为“客观文化特征理论”和“主观认同理论”两类。

民族属性是人最重要的社会属性之一。根据 Fredrik.Barth 等人的观点，民族认同(identity)主要产生于民族的边界和民族的互动关系中(Fredrik.Barth eds “**Ethnic Groups and Boundaries: The Social Organization of Culture Difference**” Boston, Ma: Little Brown,1969)，是什么构成了民族边界呢？

比较传统的“客观文化特征理论”较多强调不同文化、不同体质特征、自然地理环境等外显的因素对民族边界的影响。而“主观认同理论”则强调民族之间的边界更主要是产生于不同人群的主观认同。这种理论较多强调经济利益、政治权力等社会资源的争夺对民族边界形成的影响。

持这种观点者认为，各民族之间的差别主要不是因为他们之间存在客观的种族或文化的差异，更重要的是决定于人们的主观意识，即主观上认为与其他人群之间存在差异。文化差异只是民族认同和族界维持的一种结果。只要人们在互动中保持民族认同，就必然会产生民族区分的文化和维持族界的标志。这种观点强调内部认同和族界维持对于民族区分的重要意义，相对于内部的认同和族界的维持，外部的文化只是次要的、可变的。

我比较赞成这样的观点：民族边界的形成，既有文化差别等客观原因，也有主观认同的原因。不同人群在政治、经济等方面的资源竞争，往往对两个民族之间的关系，对民族边界的形成有更大的影响。

笔者认为，民族既是文化的，也是政治的。民族既承载着精神上和心理上的象征性、情感性，承载着不同的文化认同；也承载着物质上的利益。但在实际的民族关系中，起更大影响的，或者说更难以突破这个界限的往往是其政治性和物质利益性的一面。也就是说，当我们观察两个民族之间的关系时，可以发现，文化的差别并不难克服，而当两个民族之间存在较明显的利益差别时，民族关系则较难协调。以民族为旗号进行的利益争夺，又可分为民族成员普遍的利益诉求和主要表现为民族上层的利益诉求。当这种争夺主要对民族上层有利时，或者说主要使民族上层受益时，发动这种争执的则主要是民族上层人物。于是民族上层人物就有更强的民族性，因为他们需要利用民族的旗号来发动群众，为本阶层争夺利益。这个时候，普通大众和上层人物对民族之间的看法是不一致的。但上层人物有较多的社会表达机会，因此有较大的社会影响。而普通大众表达自己看法的机会则较少。

与历史上相比，最近 50 余年来，是中国的民族关系最好的一个时期，与当今世界上其它国家相比，中国也是民族关系最和谐的国家之一。中国的民族关系经历了“文革”动乱、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等各种考验，始终团结稳定。正如邓小平同志指出的：“我们中国是团结的，我们在处理民族问题上好的”(1986 年 12 月 30 日的一次内部讲话)。“中国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没有大的民族纠纷”(《邓小平文选》第 3 卷，362 页，人民出版社)。



但是，在个别地区，例如在新疆，在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至 90 年代中期之间，也曾发生过一些不同民族之间的冲突事件。笔者试图通过对新疆维汉民族关系的调查，来分析民族之间关系的特点。

调研过程介绍

自 2003 年以来，我们一直在进行新疆地区民族关系与社会稳定问题的调查与研究。2005 年 6 月接受了中央政法委新疆工作协调组分配的调查研究任务以后，我们成立了由杨圣敏教授任组长的研究小组，当月就派两位博士研究生赴新疆的吐鲁番、库车、且末和乌鲁木齐等地进行实地的调查。7 月下旬，杨圣敏教授再率课题组成员赴新疆开展调查，调查地点主要为乌鲁木齐市、阿克苏地区、克孜勒苏州、喀什地区、和田地区和库尔勒地区。我们调查的方式分为个别访谈，召集各类座谈会、较大规模的问卷调查和搜集各类文献等。我们访问了自治区政法委、统计局、安全局和民宗委等部门及各地区各县的政法委、民宗委、统计局、公安局等部门，在各地区都召集了与政府部门负责干部的座谈会，个别访问了各级各民族干部、农民、工人、宗教职业者、教师等类知识分子以及大学生和退休人员等共 60 余人，整理出座谈会资料 10 万余字，各类访谈资料 8 万余字。还搜集了部分政府和民间提供的各类文献材料。在此基础上，我们对新疆目前的民族关系、稳定问题进行了探讨，结合我们多年来的研究，提出一些初步的看法，仅供参考。

如何评价新疆的民族关系现状

新疆维吾尔族和汉族的人口占新疆总人口（1963 万）的 80%，这两个民族之间的关系如何，对新疆社会当前和今后的动向都有重要影响，特别是对新疆社会的稳定有决定性影响。准确评估这个关系目前的状况，找出其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及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也是我们此次调研的一个目标。

自 90 年代初以来，新疆的三股恶势力制造的多起暴力恐怖事件，在国内和国际上都造成了明显的影响。此后，有越来越多的国外研究者对中国新疆的局势表示关注，并发表了很多有关的报告。¹其中有不少报告和评论是关于新疆的维吾尔族与汉族的关系。我们阅读了其中大部分作品，在这些报导中，大多将新疆的民族关系描述的很紧张，认为新疆的局势动荡不安。例如，2003 年夏，一位外国学者²，在新疆乌鲁木齐的两个街区进行了维汉关系调查后得出结论，认为：

（1）两个民族的整合度很低；（2）维吾尔人有很强烈的民族认同感；（3）不论汉族还是维吾尔族包括当地干部都对对方存有偏见；（4）维吾尔族对政府有关少数民族的政策和对民族分裂分子的政策极为不满（“新疆的民族关系”《当代中国》2003-12（36），8 月，香港版）。

我们不同意国外学者对新疆民族关系的评价。通过自己的调查，我们认为，新疆维汉之间的关系是好的。

¹. 参看近年的出版物，如：Nicolas Becquelin《十九世纪的新疆》，《中国杂志》44 期，（2000 年七月），65—90 页；Dru Gladney《维吾尔族去向何方：中国的土著民族和内部殖民政策》，《哈佛大学亚洲和平评论》3（1），（1998/9），11-15；Emily Hannum 和 Xu Xie 的《中国西部民族的形成：新疆汉族和少数民族分布之差别 1982—1990》，《人口统计学》35（3），（1998），323—333；Colin Mackerras 的《跨世纪的新疆以及分裂主义的起因》，2001 年 7 月 5 日—8 日于堪培拉举办的澳大利亚 2001 年中国研究学会年会论文；Justin Jon Rudelson《绿洲认同：中国丝绸之路上的维吾尔族认同》，《纽约：哥伦比亚大学》，1997；Barry Sautman 的《中国少数民族优惠政策：以新疆为例》，《民族主义和民族政策》4（1—2），1998 年春夏，86—118 页，以及此作者的《新疆是一个内部殖民地吗？》，《中亚》2（2），（2000），239—271；Joane Smith 的《维吾尔人的四代：新疆青年民族政策意识的转变》，《中亚》2（2），（2000），195—224 页；David Wang 的《苏维埃庇护下的伊宁事件：新疆民族冲突和国际抗衡》（1944—1949）（香港中文大学，1999）。

例如，Becquelin, Gladney, Rudelson, Sautman 和 Mackerras（见前注）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在新疆进行了田野工作。

² 哈博特 S. 耶，香港浸信会大学行政管理与国际研究系教授。



民族关系调查

我们认为，国外学者，由于他们不可能在新疆进行深入的实地调查，其论据往往是薄弱的，他们的问卷调查与统计，样本量不够，（如，上述的哈博特·耶先生仅以其在新疆乌鲁木齐市做的200余份问卷调查为依据，就做出了结论。）这样得出的分析结果，往往不够准确。为此，我们于2004和2005年在新疆的乌鲁木齐、喀什、库车、吐鲁番、莎车等十余个县市进行了问卷调查。2004年我们共发放问卷2000余份，2005年发放问卷近1000份。

问卷设计的问题主要涉及到民族认同感、民族间交往互动、掌握异民族语言状况、对宗教问题的态度、对政府实施的一些政策的看法、对干部与群众关系的评价等方面，共40多个问题。我们于2003年在新疆做了部分访谈等形式的初步调查，并根据访谈中发现的问题设计了问卷和访谈的问题。2004年暑假期间到新疆正式调查，采用了抽样问卷调查与入户访谈相结合的方法进行调查。2004年的问卷初步统计出结果后，2005年再次在且末县、库车县等地进行了部分更有针对性的访谈。

调查点的选择主要考虑样本的代表性，根据维吾尔族的分布比例，采取分层随机抽样的方法。大城市选择了新疆首府乌鲁木齐市；中等城市选择了喀什市——南疆维吾尔族最为聚居的古老名城；县级城镇选择了历史名镇库车镇；考虑到这三个城市都有程度不同的维汉杂居情况，因此除了以维吾尔族为主要调查对象之外，对城镇的汉族也进行了调查。维吾尔族中农民比重最大（2000年占在业人口的80.514%），因此我们选取了东疆的托克逊县、南疆中部的库车县、新疆最大的农业县——莎车县和塔里木盆地西南缘的麦盖提县等四县，主要对农民进行了调查。在上述各县再分别各选定五个乡，每个乡样本量不超过60份，多数为50份。每个乡至少要选取两个大队（居民委员会），再在每个大队中各选取两个生产小组，隔5户选取一个样本进行调查。

调查对象为17岁以上（在校大学生中有17岁）的维汉族男女。

2004年调查点分布图

- | | | |
|----|---|-----------------------------------|
| 城镇 | } | 乌鲁木齐市：坑坑寺街道、全疆公务员培训班、全疆汉语教师培训班等 |
| | | 喀什市：恰萨街道、吾斯塘布依街道、库木德瓦孜街道 |
| | | 库车镇：热斯坦街道、解放路小区 |
| 农村 | } | 托克逊县：托台乡卡克卡克大队5个村民小组 |
| | | 库车县：乌恰乡、伊西哈拉乡、玉奇吾斯塘乡、牙哈乡、乌尊乡 |
| | | 莎车县：英吾斯塘乡、米下乡、古丽巴格乡、塔合其乡、托木斯塘乡 |
| | | 麦盖提县：巴扎杰米乡、西提顿乡、央塔克乡、库木克萨乡、昂格特勒克乡 |

在确定了调查点的同时，针对各调查点的特点，我们还对点内抽样进行了细化，并根据人类学实地调查的规范，制定了一系列操作的细则。

第一，进行分阶层的抽样，其比例根据当地人口的职业结构来定。2000年五普数据显示，维吾尔族总人口为8,399,393人，从事第一产业的达到在业人口的80.514%，实际抽样比也最大，这基本符合总人口的职业分布比。

我们尽可能按照国际学术界承认的、规范的方法进行问卷和访谈，我们认为只有这样的研究成果才能在学术和政治领域广泛对话，以理服人。我们的问卷样本量比所有此前的调查更多，范围更广。我们访谈的对象包括了各个阶层各种职业和地区的40多位维吾尔和汉族人士。



国际民族学、人类学界对衡量两个民族之间关系的好坏程度设计了一些评价指标，这些指标已为多数学者们所认同。如，两个民族之间对对方风俗的了解程度，交友情况，通婚比率，语言掌握情况，相互信任度等。根据这些指标，我们在问卷中设计了一些问题。

以下，我们援引其中的几个统计数字来简要介绍我们的调查结果：

一、维吾尔与汉族的整合程度

两个民族之间的整合程度是衡量民族关系的重要指标之一。这可以从是否了解对方风俗习惯、与异民族的交友情况以及通婚态度等几个方面看出。

1. 对异族风俗了解的程度

由于生活在乡村的汉族很少，两个民族交往的机会很少，因此乡村维吾尔族对汉族习俗“不了解”的比例很大（42.6%）。而城镇是维汉族的杂居地，交往机会多，彼此了解习俗的程度对相互间能否顺利交往影响很大，因此我们主要对城镇两个民族的交友情况加以分析。

表1：城镇维汉了解异民族习俗情况分析表（%）

	不了解	了解一点	了解	非常了解	总计
维吾尔族	12.1	53.0	27.7	7.2	100.0
汉族	7.4	56.7	30.4	5.6	100.0
合计	11.1	53.8	28.3	6.8	100.0

由表1可以看出，城镇中，只有7.4%的汉族不了解维吾尔族的习俗，同一指标比维吾尔族低5个百分点。这说明城镇的汉族比维吾尔族更了解对方的习俗。当然，乡村的维吾尔族对汉族的习俗了解更少。这其中有多方面的原因，第一，维吾尔族信仰伊斯兰教，从饮食到一些行为规范都有很多忌讳；而汉族多数人没有很明显的宗教信仰，又大多来自内地不同省区，习俗上也有很多不一致之处；第二，主动程度不同。维吾尔族是当地的世居民族，而来自内地的汉族更愿意主动了解维吾尔族的习俗，希望与之搞好关系，尽快融入当地的小区中；第三，民族心理不同。大多数维吾尔族对别人是否尊重自己比较敏感，而汉族对这一点反应较平淡。这使得汉族在交往前会主动了解其习俗，以免交往中不慎伤了和气，一般言行比较谨慎。

2. 与异民族交友的情况

表2：对异民族风俗的了解程度对交友的影响百分表（%）

	没有	一个	两个	三个或三个以上	总计
非常了解	18.3	4.8	6.7	70.2	100.0
了解	19.4	5.1	7.7	67.8	100.0
了解一点	41.3	8.1	10.2	40.3	100.0
不了解	81.5	6.0	4.0	8.5	100.0
合计	45.7	6.8	8.0	39.5	100.0

调查结果（如表所示）显示，是否了解异民族的习俗直接影响与异民族的交友。在回答本问题的2,088个调查对象中，“非常了解”对方习俗的人中拥有“三个或三个以上”的异族朋友的比例最高（70.2%），“没有”异族朋友的比例最低（18.3%），而“不了解”对方习俗的人中正好相反（以上两个比例分别为8.5%和81.5%）。



表3：城镇分民族交往异族朋友情况百分表（%）

	没有	一个	两个	三个或以上	总计
维吾尔族	29.5	5.6	8.0	56.9	100
汉族	28.5	10.7	14.8	45.9	100
合计	29.2	6.8	9.5	54.4	100

城镇的维汉族与异民族的交友情况相差不大。从表九可以看出，维吾尔族与汉族相比，“没有”异族朋友的比例（维族 29.5%，汉族 28.5%）仅仅相差一个百分点，这说明两个民族拥有异民族朋友的比例差不多。在拥有异民族朋友的数量分布上，两个民族是有差异的。汉族拥有“一个”和“两个”异族朋友的比例（29.5%）比维族（14.6%）高，而维吾尔族拥有“三个或三个以上”异族朋友的比例（56.9%）比汉族（45.9%）高 10 个百分点。

表 4：城乡维吾尔族的汉语程度对异族交友的影响百分表（%）

	没有	一个	两个	三个或三个以上	总计
不会	80.5	4.1	4.4	10.9	100.0
会说一点儿	34.1	9.8	10.0	46.1	100.0
说可以写一般	25.3	6.3	9.3	59.0	100.0
会说会写很熟练	16.3	5.3	6.0	72.4	100.0
合计	48.2	6.2	7.0	38.6	100.0

事实上，我们发现拥有异民族朋友的数量与掌握异族语言的程度和职业有关，表 4 显示，“不会汉语”的维吾尔族中，“没有”汉族朋友的比例最高（80.5%），拥有“三个或三个以上”汉族朋友的比例最低（10.9%）；而“会说会写很熟练”的人中这两个比例正好相反（分别是 16.3%和 72.4%）也就是说语言障碍越小越有利于相互交往。

3. 对通婚的态度

通婚率是反映两个族群整合程度的最重要指标。2000 年第五次人口普查仅有 0.56%，这说明维汉通婚率是异民族通婚比率较低的。我们希望了解两个民族的通婚阻力主要来自哪一方，因此在问卷中专门考察了“通婚态度”。

表5：城镇维汉异族通婚态度百分表（%）

	可以	不可以	很难说清	不知道	总计
维吾尔族	29.9	37.6	19.3	13.1	100.0
汉族	68.5	9.3	17.4	4.8	100.0
合计	38.8	31.1	18.9	11.2	100.0

由表 5 可见，维吾尔族中认为“不可以”通婚的比例为 37.6%，其中乡村的维吾尔族认为“不可以”通婚的比例比城镇还高，达到 42.0%。认为“可以通婚”的维吾尔族仅占 27.4%，这大大低于持相同观点的汉族（68.5%）。这一比例比汉族高出 28.3 个百分点，看来主要是维吾尔族不能接受两族通婚。也可以说，汉族对维汉族通婚反映平淡，而维吾尔族却反映强烈。因为那些与汉族通婚的维吾尔族很难被小区接受和容忍，要想顶住压力，在当地生活下去很不容易。通婚的障碍主要是两个民族的文化背景不同，其语言、宗教以及由此导致的生活方式、行为方式差异，特别是宗教信仰的差异应该是妨碍通婚的主要原因。

从上述三方面可以看出，汉族比维吾尔族更了解对方的风俗，城镇的维族比乡村的更了解汉族的习俗；对异民族习俗了解越多，越有利于交异族朋友，城镇维汉两民族的交友情况相差不大，



交友的多少与掌握异族语言的程度和职业分布有密切的关系；维汉民族通婚的阻力较多来自维吾尔族。

4. 掌握异民族语言的情况

表6：城镇分民族掌握对方语言情况百分表（%）

	不会	会说一点	说可以写一般	会说会写很熟练	总计
维吾尔族	16.6	29.1	24.1	30.2	100
汉族	57.8	34.1	4.1	4.1	100
合计	26.0	30.3	19.5	24.2	100

表 6 表明，维吾尔族掌握汉语（“会说一点”以上占 83.4%）比汉族掌握维吾尔语（“会说一点”以上占 42.2%）的比例几乎高一倍。汉族不会说维吾尔语的占 57.8%，维吾尔族不会说汉语的仅有 16.6%。

仅仅看这些数据远远不够，我们还应该探讨造成这一结果的原因。首先，两民族学习语言的条件不同。在新疆，维吾尔族中小学教育把汉语列为必修课，促进了汉语的学习。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政府提倡汉族干部学维语，但其它阶层的汉族人学维语的较少，因此城镇的汉族人掌握维吾尔语的比例较小。

第二，语言环境不同。城镇的维吾尔族在很多场合中，往往以汉语为交际语，懂汉语学汉文成为一种生活需要；维吾尔族聚居的乡村，汉族比例低，不会说维吾尔语寸步难行，大多数乡村的汉族都能讲一口流利的维吾尔语，其中很多汉族干部还精通维文，能阅读维文报纸，甚至能用维文写作。

第三，学习语言的动力不同。除了政府在乡村任用汉族干部时要求掌握维吾尔语之外，其它的汉族人学习维语动力较小。而对于城镇的维吾尔族人来说，懂汉语已成为重要的生存技能之一。

表 7：乡村维吾尔族不同受教育水平掌握汉语情况百分表（%）

	不会	会说一点儿	说可以写一般	会说会写很熟练	总计
不识字或很少	91.0	8.5	.5	.0	100.0
小学	76.6	18.8	3.6	1.0	100.0
初中	53.4	38.6	6.8	1.2	100.0
高中、中专、职高或同等学历	27.0	40.5	24.3	8.1	100.0
大专	4.9	29.3	51.2	14.6	100.0
本科或以上	5.9	17.6	35.3	41.2	100.0
T合计	62.7	25.1	9.1	3.1	100.0

通过资料分析我们发现，影响到汉语程度的主要因素是受教育水平。从表 7 “乡村维吾尔族分受教育水平掌握汉语情况表”可以明显看出，“不识字或很少”的人“不会汉语”的比例高达 91.0%，“会说会写很熟练”的比例却为 0；“大学本科或以上”的人“不会汉语”的仅有 5.9%，“会说会写很熟练”的比例最高，达到 41.2%。这充分说明受教育水平越高，汉语越好，受教育水平越低，汉语越差。两者呈明显的正相关关系。

表 8：“会说汉语”的城乡维吾尔族职业分层百分表（%）

	城镇	乡村	在样本中所占比例
大中专在校生	71.0	63.0	10.0
农民	—	27.9	42.2
国家干部	83.9	74.1	12.4



商人	56.2	42.6	9.2
工人	68.4	—	3.3
知识分子	73.2	62.1	11.4
退休人员	67.7	—	2.1
待业或无工作	63.5	—	4.7
其它	67.7	—	4.7

注：如果样本量太小，低于 20 个，不具有代表性，因此用“—”表示。本表反映的是指除了“不会”以外，“会说一点儿”、“说可以写一般”和“会说会写很熟练”三个回答的总和。

二、认同问题：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

民族认同的强弱是衡量民族凝聚力大小的一个重要指标。“民族”是一个天赋身份，即一个人一出生就有的身份，人们从懂事起就把自己视作该民族的成员。民族认同感越强，越有利于保存和发展民族传统和文化，越难以被主流民族或主流文化同化和整合。

表 9：“您为自己的民族而自豪吗？”回答百分表（%）

	非常自豪	自豪	不太自豪	不自豪	没想过	总计
维吾尔族	67.1	25.3	1.0	1.2	5.5	100.0
汉族	20.2	34.1	2.2	2.2	41.2	100.0
合计	61.1	26.4	1.1	1.3	10.1	100.0

由表 9 可以看出，维吾尔族中为自己的民族感到“非常自豪”的比例（67.1%）比汉族（20.2%）高出近 47 个百分点，感到“自豪”和“非常自豪”的占 92.4%，比汉族的 54.3% 高得多；而“没想过”这一问题的比例汉族高达 41.2%，同比维吾尔族仅占 5.5%。这说明维吾尔族的民族认同感比汉族强。那么民族认同感强是否会影响到国家认同呢？为此我们又问“您是否为自己是一个中国人而感到自豪？”。

表 10：分民族回答“您是否为自己是一个中国人而自豪”百分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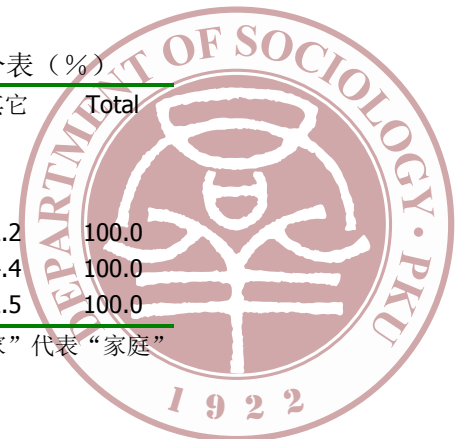
	非常自豪	自豪	不太自豪	不自豪	没想过	不愿回答	Total
维吾尔族	59.4	31.2	2.8	.9	3.3	2.3	100.0
汉族	40.4	40.4	6.3	2.6	6.7	3.7	100.0
Total	57.0	32.4	3.2	1.1	3.8	2.5	100.0

如表 10 所示，维吾尔族中认为“非常自豪”和“自豪”的占 90.6%，其中乡村的维吾尔族达 95%，同比汉族为 80.8%。维吾尔族仍然比汉族的国家认同感高 10 个百分点，说明维吾尔族的民族认同感（92.4%）与国家认同感（90.6%）相当，二者都很强，即都比汉族的（分别是 54.3% 和 80.8%）强。看来维吾尔族的国家认同感没有因为民族认同感强而削弱，两种认同感不是此消彼长的关系。

表 11：分民族对“民族、国家、个人、家庭”四个概念排序百分表（%）

	民— 个— 家— 国	家— 国— 民— 个	国— 民— 家— 个	个— 家— 民— 国	民— 家— 个— 国	家— 个— 民— 国	没想 过	其它	Total
维吾尔族	4.5	5.2	61.8	10.6	2.1	3.7	10.0	2.2	100.0
汉族	1.1	4.	72.6	7.0	.4	8.1	1.9	4.4	100.0
Total	4.1	5.1	63.2	10.1	1.9	4.3	8.9	2.5	100.0

注：“民”代表“民族”、“个”代表“个人”、“国”代表“国家”、“家”代表“家庭”



如果说纵向比较略显单薄，那么我们希望进行一个横向比较，请被调查者把“民族”、“国家”、“个人”、“家庭”这四个概念排一下序，目的是考察一下当这些利益发生矛盾或冲突时，在人们的心目中孰轻孰重。

由表11可以看出，61.8%的维吾尔族把“国家”排在“民族”之前，选择同一个顺序的汉族为72.6%，比维吾尔族高10个百分点。也就是说，近三分之二的维吾尔族会把国家利益放在民族利益之上。选择“没想过”的维吾尔族高达10.0%，这也符合实情。因为那些世代生活在新疆绿洲上的维吾尔族很少会想这么高深的问题。

三、相互间是否信任

要考察维汉两个民族之间是否相互信任，我们首先要看他们是否对对方存有偏见（日常生活中，我们常称之为“成见”）。因为民族偏见是影响双方沟通、理解的最大障碍，如果难以沟通和理解就谈不上相互信任。

表 12: “您认为汉族（维族）聪明吗？” 回答百分表（%）

	都很聪明	大部分聪明	一部分聪明	都不聪明	很难说	不愿回答	总计
维吾尔族	6.8	34.7	30.8	2.8	14.5	10.4	100.0
汉族	14.8	28.1	40.4	1.1	9.6	5.9	100.0
T合计	7.8	33.9	32.0	2.6	13.8	9.9	100.0

当问及“对方民族是否聪明”时，无论维族还是汉族被调查者（见表12），答案都集中在“大部分聪明”和“一部分聪明”上，维族为65.5%，汉族为68.5%，二者相差不大。不过维吾尔族认为“很难说”和“不愿回答”的比例（24.9%）高于汉族（15.5%）。这应与乡村的很多维吾尔族人没有接触汉族人的机会有关。

表 13: “您认为谁更讲究卫生” 回答百分表（%）

	大多数汉族	大多数维族	两个民族差不多	很难说	不愿回答	总计
维吾尔族	7.4	30.0	50.8	7.2	4.6	100.0
汉族	33.5	7.8	38.3	16.0	4.5	100.0
合计	10.8	27.2	49.2	8.3	4.5	100.0

如表13所示，当问及“您认为谁更讲究卫生”时，近三分之一的被调查者都认为“自己民族的大部分人”更讲究卫生，即对对方民族的卫生习惯持有偏见。与此不同的是，维吾尔族中有50.8%的人认为“两个民族差不多”，这比汉族持有相同观点的（38.3%）高出12个百分点，这说明维吾尔族被调查对象比汉族的更加客观。汉族中认为“很难说”的占16.0%，比维吾尔族的（7.2%）高一倍以上。由此看来，汉族被调查者的观点比较隐蔽，这与他们多年生活在新疆养成了处处谨慎的习惯有很大关系。

表 14: “维汉关系”评价百分表（%）

	很好	一般	不太好	不好	不知道	总计
维吾尔族	32.0	54.3	6.9	1.5	5.3	100.0
汉族	15.6	62.6	14.8	4.1	3.0	100.0
合计	29.8	55.3	7.9	1.9	5.0	100.0

那么，两个民族对“维汉关系”是如何评价的？从表14可以看出，汉族被调查者认为“很好”



的比例（15.6%）是维吾尔族的一半（32.0%）。而认为“不太好”和“不好”的比例（18.9%）却是维吾尔族的（8.4%）两倍以上，即汉族被调查者认为“两民族关系不太好”的比例更大。认为“还可以”这一观点的人最多（汉族为 62.6%，维族为 54.3%）。两个民族都有 80%以上的人认为关系好或是还可以，那么其它的外人还有什么理由说这两个民族关系很不好呢？

四、对生活和治安的满意度

我们希望被调查者从生活水平提高的快慢、当地经济发展的快慢、对治安的满意度等方面来考察他们对现实的满意程度。

表 15: “改革开放以来，您认为自己的生活水平提高得快还是慢”回答百分表（%）

	快	差不多	慢	不知道	Total
维吾尔族	56.9	25.5	14.3	3.3	100.0
汉族	54.1	28.5	16.7	.7	100.0
Total	56.5	25.9	14.6	3.0	100.0

两个民族的被调查者都有半数以上的人（维族为 56.9%，汉族为 54.1%）认为“自己的生活水平提高得快”，认为“差不多”即变化不太大的比例分别为（维族 25.5%，汉族 28.5%）。其自我评价没有明显的族际差异。

表 16: “您对目前的生活水平满意吗？”回答百分表（%）

	满意	基本满意	不太满意	不满意	Total
维吾尔族	40.0	34.6	20.1	5.3	100.0
汉族	10.0	53.0	28.5	8.5	100.0
Total	36.2	36.9	21.2	5.7	100.0

从表 16 可见，只有 40%的维族被调查者和 10%的汉族被调查者对自己目前的生活水平感到满意，表示“基本满意”的比例汉族（53%）高于维族被调查者（34.6%）近 20 个百分点。表示“不太满意”和“不满意”的被调查者中汉族（37%）高于维族（25.4%）。这一差别主要因为所比的对象和方式不同，维吾尔族对外界了解少，通常跟自己的过去进行纵向对比，而汉族习惯于跟内地做横向比较。结果表明生活水平提高得快慢与满意度不是正相关关系。

表 17: “您对您所在地区的社会治安状况感到满意吗”回答百分表（%）

	很满意	满意	基本满意	不满意	不清楚	Total
维吾尔族	22.5	44.6	25.3	5.0	2.6	100.0
汉族	4.1	15.6	52.2	28.1	.0	100.0
Total	20.1	40.8	28.8	8.0	2.2	100.0

从调查结果看来（表 17），对治安状况表示基本满意及以上的，维吾尔族高达 90%以上，汉族达 70%以上。这应是新疆局势比较稳定的一个左证。

五、对分裂主义活动的态度

表 18: “参与分裂活动对大多数人都是有害的”这种说法您同意吗？回答百分表（%）

	非常同意	同意	不太同意	不同意	完全不同意	很难说	总计
维族	42.7	45.4	3.7	3.5	1.3	3.5	100.0
汉族	55.6	37.8	1.5	3.0	.4	1.9	100.0
合计	44.3	44.4	3.4	3.4	1.2	3.3	100.0



结果显示（表 18），对“参与分裂活动对大多数人都是有害的”这一观点持肯定态度的被调查者占大多数（“非常同意”和“同意”之和），其中汉族（93.4%），维族（88.1%），可见民族分裂活动在两个民族中都是被绝大多数人反对的。

六、我们的结论：

综合以上的统计和初步的分析，我们很显然会得出如下的结论：

新疆维吾尔族与汉族之间的关系基本上是好的，新疆的局势基本上是稳定的，民族分裂分子的活动是不得人心的。

困惑与问题：如何解释突发性民族冲突事件

我们的调查是符合学术规范的，我们也相信我们的调查结果是可信的。在新疆各地多年的调查中，我们确实得到了很多维汉民族团结方面的材料和事例足以支持我们的结论。但却有一个问题需要解答。既然民族关系是好的，为什么在 80 年代至 90 年代中期，新疆屡次爆发突发性民族冲突事件？更重要的是，如果说这次调查反映的仅仅是目前新疆民族关系的状况，并不代表以前新疆的维汉民族关系，那么，是否以前导致民族冲突事件的原因已经得到解决了呢？是否今后就不会再发生以前那种群体性民族冲突的突发事件了呢？

这些较大规模的排汉和民族分裂活动，大多都有恐怖组织在背后的指使和策划。但是这些恐怖分子为什么能够在短时间内，在新疆各个地方，屡次煽动起如此多的维吾尔族群众参加这些针对普通汉族群众的暴力活动？

我们应如何评估过去这些针对汉族的群体性暴力突发事件？过去发生的这些暴力事件是否就证明了我们近年来有关维吾尔族与汉族关系较好的调查是不真实的、不可靠的、不准确的？仅仅是一种表面现象？

文化性差别与结构性差别

如何解释以下两种矛盾的现象，即当我们对新疆维汉民族之间的关系进行单个人的问卷调查和访谈时，得到的结果表明双方关系较好；而部分维吾尔族群众在受到其他人的挑动时，又为什么屡次发生针对汉族群众的群体性暴力恐怖事件呢？

我们认为，这两种情况下维吾尔族群众的表现都是真实的。民族学、人类学界对民族关系研究所归纳出的一些认识和理论，可以帮助我们解释新疆维汉民族关系中出现的这两种看似矛盾的现象。

在讨论不同族群之间的互动情况的时候，区分个人层面（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互动与族群层面的互动是很重要的。两个族群之间或许为了经济资源和政治权力的竞争而出现冲突。然而，个人层面的互动，并不一定出现冲突。

民族学界的一些学者认为，不同民族之间因为有各种差别，才会有矛盾。民族关系中的差别又可以分为两类，即结构性（社会、经济）差别与文化性差别。结构性差别比文化性差别对民族关系的影响要大。许多民族之间的爆发性冲突都是由于有结构性差别而扩大成群体性冲突的。并且这类冲突在结构性差别减小以前是很难完全消除的。东南亚一些国家，如印度尼西亚半个多世纪以来时断时续地出现的排斥华侨事件，就是这类典型¹。

两个民族之间文化上的差别，一般来说并不会直接构成双方大规模的冲突。这样的差别所造

¹ 现在，印尼的大部分青年华侨已经不会汉语和汉文了，在很大程度上已接受了当地民族的风俗文化。但由于他们在经济收入和政治地位上与土著民族仍有明显差别，因此一遇风吹草动，仍会出现当地人大规模的暴力排华事件。



成的两个族群间的陌生与隔阂往往是可以化解的。宗教信仰、风俗和生产生活方式差别明显的两个民族可以长期和平甚至友好相处。在个人的层面如此，在两个群体的层面也是如此。这样的例子在全世界比比皆是。但是，两个有明显结构性差别的民族，就是说两个在政治、经济地位上差别明显的民族，却很容易在相处中爆发群体性突发性冲突。这类冲突往往由一些小事或个别人之间的冲突引起，很快扩大成大规模的，两个民族之间的突发性暴力冲突。2005年年底在法国巴黎发生的外来移民的大规模骚乱，就是这样的一个典型案例¹。

新疆的维吾尔与汉族之间是否有结构性的差别

自1949年新疆和平解放以来，中央政府在财力上一直给予新疆大力扶持。1979—1990年，中央政府给新疆的财政补贴为206.5亿元，是同期新疆地方财政收入的2倍。1995—1998年，财政补贴达886.63亿元。50年来，新疆的经济和社会都有了很大的发展。如1998年，新疆自治区国内生产总值达1116亿元（2004年达2200亿元），比1955年增长24倍；城市居民人均收入5131元，比1980年增长11倍；农牧民人均收入1600元，比1955年增长7.9倍。1949年，新疆少数民族人口中95%以上是文盲，到1998年新疆青壮年非文盲率已达96%。²2001年，新疆国内生产总值达1485.48亿元，比1998年又增长了33%，比1949年（7.91亿元）增加了180多倍，比1978年（39.07亿元）增加了37倍。

尽管如此，新疆与中国东部地区在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上的差距仍然明显。在新疆境内，汉族居民较多的北疆和维吾尔族居民为主的南疆也有一定的差距。据自治区政府2004年的统计，当年北疆人口占全区总人口的23.3%，而北疆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却占到了全区的55.2%。新疆自治区政府没有按民族为单位的经济统计数字，但如果我们将不同民族聚居区的经济统计数字作对比，还是可以看出不同民族之间存在的差距。在南疆4个地区和州，90%的人口为维吾尔等少数民族，而汉族人口的80%左右分布于北疆和东疆。

根据2004年的统计，南疆的喀什、和田和克孜勒苏这三个少数民族为主的地区人口占全新疆总人口的33.5%，而国民生产总值只占12%。

新疆城乡居民收入的差距也较大。根据2004年的统计，新疆农村人均消费1751元，城镇则达6358元。2004年城镇人口占全区总人口的35.2%，消费总量则占66.5%；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64.8%，而消费总量仅占33.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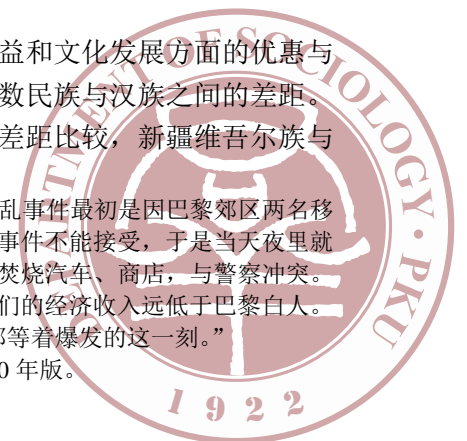
建国50余年来，为了缩小新疆的维吾尔等少数民族与汉族之间的差距，为了防止社会出现以民族界线为标志的分层，为了帮助少数民族更快发展，政府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各方面制定了一系列对少数民族的优惠政策。但通过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维、汉两个民族在经济收入上还是存在一定的差距。我们设想，这种差距有时会影响到心理的认同感。

其实，政府对少数民族的一些优惠政策，在实行之后，有时候会有很复杂的结果。例如：在大学招生中对少数民族实行配额录取制度，使得他们能够以比汉族考生低得多的分数被大学录取，获得了优惠，但在毕业后的就业市场的竞争力上，他们在汉语能力、知识技能等方面与汉族学生有明显的差距。这种差距显然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心理的认同。

尽管如此，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对少数民族在政治权利、经济利益和文化发展方面的优惠与扶持政策，已经大大提高了各少数民族的发展水平，极大地缩小了少数民族与汉族之间的差距。在新疆也是如此。与西方国家一些主体民族与少数民族之间的结构性差距比较，新疆维吾尔族与

¹ 如2005年十月在法国爆发的外来移民的大规模骚乱，烧毁汽车4000多辆。骚乱事件最初是因巴黎郊区两名移民青年在受到警察追捕时逃入一所变电站触电身亡而引起的。青年移民们对此事件不能接受，于是当天夜里就爆发了数百青年人上街的骚乱，随后几天内骚乱就由巴黎蔓延至全国。移民们焚烧汽车、商店，与警察冲突。移民主要来自北非和中东。这些移民在融入法国主流社会中遇到很大困难，他们的经济收入远低于巴黎白人。面临很多失业等困难。骚乱参加者说，“这里聚集着太多的失败。所有这一切都等着爆发的这一刻。”

²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府办公厅编《新疆辉煌50年》1949—1999，新疆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汉族之间的差距是较小的，本不应该成为大规模冲突的根源。

被人为恶意夸张了的差别

我们在新疆的调查表明，从总体上看，新疆的汉族与维吾尔族之间在经济收入上存在着差距，但这种差距是较小的，它可能会成为影响两个民族之间关系的一个因素，但不应该成为民族间大规模冲突的理由。新疆在 2000 年以前所发生的多次群体性突发性暴力事件，特别是事件中那些煽惑普通群众反对汉人的口号却清楚地告诉我们，民族之间本来微小的差距被恶意地夸大了，并进而被用来鼓动维吾尔族群众，特别是那些缺乏识别能力的年轻人对汉族群众和政府的暴力攻击。是谁在夸大和利用这些差别呢？

谁在引领社会认识和社会舆论？

民族关系，不是个人之间的关系，是两个人群之间的关系，两个不同文化的人群之间的关系。任何一个人群的认识与态度，主要是受内部少数人影响，或是受少数人带领的，即这个人群中的精英阶层的影响。

人都是社会的人，一般的民众主要是受各种精英分子的影响获得各种社会观点，从而采取各种态度和行为。但精英集团首先考虑的往往是本集团的利益。这也是民族之间的关系较多受精英利益影响的原因。因此，分析民族之间关系好或不好的原因，需要首先从精英分子的角度考虑，从精英分子的利益中找原因。

在民族关系、对政府评价等问题上，谁对维吾尔族社会的广大群众有比较大的影响？我们相信政府无疑是新疆社会有最大影响的力量。除了政府之外，在维吾尔族群众中，还有谁在引领社会舆论？显然，宗教上层人士、各级政府的干部、知识分子阶层对维吾尔族普通大众有最大的影响力。排斥汉人、民族分裂和极端民族主义活动对普通大众没有任何的好处可言，受益的仅是少数有野心的上层人士。在民族聚居区，利用民族情绪进行社会动员，是成本最低、最容易发动的一种社会动员。自上世纪 80 年代以来新疆出现的多次群体性暴力排汉突发事件，都是这样的一种社会动员。实质上它表达和追求的是极少数民族上层人士的诉求和利益，并不是广大维吾尔族民众的意愿和利益。

简短的总结

通过我们在新疆的实地调查和很初步的分析，我们认为，尽管维吾尔与汉族在文化上有很明显的差别，但这种差别并没有造成两个民族相互之间明显的偏见，相反，多数人对对方的文化是理解的、尊重的。这说明文化的差别在两个民族之间没有构成明显的障碍。但是，当两个民族之间在经济收入上的差别被人为地夸大以后，则可能对普通民众造成很大影响，从而造成民族边界的扩大，甚至造成群体性民族冲突事件。这说明，对于两个民族之间的边界来说，主观认同较客观文化的差别有更大影响。

（本文为作者在 2007 年《北京论坛》“族群关系与宗教共存”分论坛上的发言）

